

看日俄澳如何防范骗保行为

□ 管 昕

今年1月,新华社记者暗访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发现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检查科室之间相互协作,长期肆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对外发布消息称,成立由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大学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这家医院,迅速展开调查,尽快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在其他国家,骗取医保的犯罪行为是否严重?怎样严惩?又是如何防范的?

日本:私人诊所更易骗保

日本全民皆保的医疗体系虽然惠及了很多民众,但藏污纳垢甚多。

日本的非商业医疗保险由厚生劳动省管辖,实行全民皆保的制度,按照不同人群,负担比例也有所差异。比如,大多数个人负担的比例为30%,而75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上为10%。厚生劳动省每年都会根据医疗记录等方式调查医疗机构有无骗保情况。通过此类调查,2013年度不正当诊疗申请的返还额度高达146亿日元。根据目前的最新数据,2016年的返还额度

也达89亿日元。

由于日本的私人诊所也可以适用医保,因此在这种小规模机构中更容易进行不正当操作。医生骗保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捏造虚假信息,如编造假病历、开假处方等。由于最低生活保障者没有个人负担比例部分,因此一些医生利用患者这一身份编造虚假就诊信息骗取钱财。甚至还有有的医生在无经验状态下进行高难度手术,以及在盲肠等手术中给病人切除保险费用更高的部位,而非发病部位,以此获取高额费用,最终导致病人死亡。与普通医疗机构相比,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称为接骨院、整骨院的医疗机构更是浑水摸鱼。由于与其他机构的报销体系不同,整骨院更方便骗取国家保费。另外,日本暴力团伙合法化,因此一些暴力团体通过对整骨院的操纵获取钱财维系自己的生存。

俄罗斯:骗保普遍存在规模不大

医保诈骗在全民免费医疗制的俄罗斯依然普遍存在,不过涉案规模都不大。由于俄罗斯实行全民免费的医疗体制,造成普通民众购买私立医疗保险的意愿并不强烈。较低的市场需求,配合俄罗斯多年来施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在充分竞争

的环境下,俄罗斯市场上医疗保险公司虽然数目众多,但综合实力并不强大。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打击医疗欺诈,大多数中小医疗保险公司会选择将理赔审核业务进行综合外包,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医疗保险赔偿服务中心对各保险公司重大可疑理赔项目的多方参与者和相关材料进行再确认、再审查。而对于小额度的赔偿项目,一般并不会再耗费人力和时间进行过分关注。

当然,俄罗斯医院和医生对于如何能轻松通过保险公司审查的细节流程心知肚明,对于医疗账单的总金额也有一定的把控能力。比如,对于已购买私立医疗保险的病人,如果病情并无大碍,也大多会先要求做个全身检查、血液检测等。对于原本能通过物理理疗康复的疗程,一般会首选打针、吊水甚至局部手术等费用较高的治疗手段。

在俄罗斯,这种最普遍的医保欺诈现象大多是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鉴于理赔项目总金额较低,保险公司虽然心知肚明,但也并不会过多追究。然而对于理赔金额较高以及重大的医保赔偿项目,俄罗斯医疗保险赔偿服务中心和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和举证。比如在去年9月,俄罗斯彼得尔姆州

的一名居民,通过盗用他人病历,从3家医疗保险公司骗取了800万卢布的理赔金,在经过医疗保险赔偿服务中心的多方取证后,被判处三年半监禁。

澳大利亚:骗保现象较少

相较于日本和俄罗斯,澳大利亚骗取医保的情况要好很多。这跟澳大利亚医药分家的体制有直接关系。在澳洲看病去医院,拿药去药房,两者没有直接利益关联,医生就少了骗保的用武之地。

由于澳大利亚采取医药分家的体制,普通医疗诊所病人去看病,医生开具药方,病患根据药方去附近药店买药,而药店本身和医生以及诊所没有直接利益联系。这就导致医生可以给病人虚开药方,但是虚开药方本身对医生毫无益处,医生自然就不会这么干。而在住院治疗的时候,比如,在公立医院,病人需要什么药品,现场提供什么药品;所有的药品使用仅限于病人在医院内住院开药的阶段,药品并不能被病人带离医院。而病人出院之后的康复治疗,药品同样需要病患自行去和医院没有利益联系的药店买药。因此,在整个过程当中,医生也没有办法通过虚开药品来套取医保资金。

那么,在澳大利亚,医生是否就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漏洞来套取医保资金吗?其实不是,只是相对较难。比如,医生有可能通过虚增每日诊断病患的人数而获得更多医保。比如,澳大利亚有一批所谓的“神医”,每天诊治病人的数目屡创新高。有些医生号称每天可以诊治80名患者,而有些宣称自己诊治200名病人,更有人登记记录一天诊治了500名病人,相当于每一分钟诊治了一名患者。当然,这个速度绝不可能。之所以医生会申报这么高的诊断数字,是因为每诊断一个病人,就可以获得一份医保补助,比如,日诊500名病人的那一位,相当于一天就从澳大利亚纳税人手中获得了8300澳币的医保补助。澳大利亚的卫生部专业服务审查处会严格追查此类行为,情节严重者今后将无法再获得任何医保补助。



2018年是中国上海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结为友好省市的第26个年头,为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文化越古今——生活中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近日在亚历山大市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举行。图为人们参观“文化越古今——生活中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新华社记者 郭惠戎 摄

海外传真

澳大利亚严打使用兴奋剂和操纵比赛行为

本报讯 根据8月1日发布的官方报告称,澳大利亚将在体育界进行改革,目的是完善和恢复体育诚信,严厉打击使用兴奋剂和操纵比赛的行为。

这份官方报告由律师詹姆斯·伍德编纂完成。报告中呼吁,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机构应当进行重要改革,以便帮助国家层面新成立一个体育诚信委员会。

根据计划,操纵比赛等不当行为,将不再是一般的违规行为,会被升级定性为联邦犯罪,而那些违规的人员将会视情节严重程度,被处以罚款或者监禁。

“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缺乏足够的团结,去应对国内和国际操纵比赛及其相关的体

育腐败行为,”这份报告说,“而由于操纵比赛和使用兴奋剂等行为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往往将会导致公众失去对体育诚信的信任。”

澳大利亚体育部长布丽吉特·麦肯锡当天表态,高度肯定这份报告的价值,称“这将带给澳大利亚一个机会——保护我们的体育在未来几十年免受侵害”。

据调查,澳大利亚关注度高的网球、足球和板球运动,近些年曾发生过一些操纵比赛的腐败案件。

据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的数据,在2015年~2016年间,澳大利亚体育界非法赌博的资金达到72亿美元(约合490亿元人民币)。(白旭)

埃及立法严厉打击“虚假新闻”

本报讯 近日,埃及国会通过一项媒体监管法案,政府有权根据该法案对社交媒体用户加强管理,以打击“虚假新闻”。

据悉,埃及国会以超过2/3赞成的高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根据法案,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5000名粉丝的账户和博客,如果发布虚假新闻或煽动违法行为将受到起诉。埃及媒体管理最高委员会将对包括网站、博客和个人账户等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督,并有权对违法行为采取行动。据悉,该委员会负责人由埃及总统塞西亲自任命。

新法还规定,未经媒体管理最高委员会许可禁止建立网站,必要时政府可屏蔽或暂停任何网站或个人账户。此外,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地区进行新闻拍摄。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传播平台的迅猛发展,造谣诽谤、网络侵权等违法行为成为埃及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其中,网络谣言尤其是网络政治谣言由于真伪难辨、蛊惑性强,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政局失稳。因此埃及政府采取多项措施综合整治、严厉打击。

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

今年3月总统选举前,埃及司法部宣布设立热线,以搜集在传统及网络媒体上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假新闻”投诉;去年5月,埃及安全部门宣布屏蔽21个网站,原因是这些网站支持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散布谣言、恶意指责他国政府,影响恶劣;去年4月,埃及政府向议会提交两份法案,提议将用户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其国家识别码相关联以创建用户数据库,另一项法案提议建立埃及自己的社交网站。用户必须使用个人证件号码注册,以遏制虚假账户。

观察人士表示,最近一年已有10余人因在网络上传播虚假新闻而被拘捕,另有数百个新闻网站和博客被关停。

一些批评人士表示,该法案有些措辞模糊不清,对于什么是“违规行为”的定义仍有待完善。不过,法案支持者则认为,该法案有利于埃及政局稳定。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破坏极大,由于缺乏法律及政府部门的监管,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虚假新闻和谣言的滋生地。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不同账号发布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信息,混淆视听,引发民众恐慌,影响国家安全。(景玥)

韩加大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力度

本报讯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去年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243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5亿元),同比增加26.4%,韩国金融监督院将携手民间机构制作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资料,防止金融消费者上当受骗。

据韩国国家情报院、警方和检方的调查结果,电信诈骗犯罪组织的根据地大部分在海外,且多采取先在国内诈骗再向海外汇款的方式。涉案人员在韩短期停留的外国

人较多,其中多数涉案人供述,因金钱的诱惑或是友人求助帮忙而参与电信诈骗,不知道犯罪的严重性。

韩国金融监督院决定携手银行联合会和国家情报院,以韩语、英语、汉语制作宣传资料,并分发到外国人居密集区的银行营业点、机场兑换中心等处,以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

韩国《电信事业法》修正案强制要求运营商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拦截虚假主叫电话,否则将被处以罚款。(中产)

中国技术助力

马来西亚推广移动支付

去年,马来西亚主要支付服务提供商、联昌国际银行旗下的Touch'n Go(TnG)与中国企业蚂蚁金服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今年5月,他们联合推出的电子钱包产品投入运行。这款产品不仅能实现手机充值、水电等缴费、转账、买机票等,还可在吉隆坡一条地铁线路的部分站点体验刷码过闸坐地铁。图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名男士用电子钱包刷二维码买咖啡。

新华社记者 朱炜摄



边走边看

美国“最严”网络隐私保护法引关注

规定消费者对企业收集和管理其个人信息拥有更多控制权;
对企业收集处理数据的方式划定了红线

□ 王如君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议会近日通过的《2018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以下简称《法案》),由州长签署后正式成为一项保护消费者的新法。有媒体称,这是美国迄今“最严厉、最全面”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法。

《法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规定消费者对企业收集和管理其个人信息拥有更多控制权;二是对企业收集处理数据的方式划定了红线。《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拥有5万名以上消费者信息的企业,消费

者有权要求该企业披露其收集的信息类别和具体内容,包括企业收集哪些个人数据、收集目的,哪些第三方可获得使用这些数据等。消费者还有权要求企业删除所收集的个人信息。

对企业而言,《法案》规定企业要尊重消费者选择不出售个人数据的权利,不得通过拒绝给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或者通过对商品、服务收取不同的价格或者费率的方式,歧视消费者行使此项权利。此外,禁止企业在未经本人授权情况下出售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个人资料,而对于未满13周岁的儿童,则需要获

得其父母的许可。企业需要根据消费者要求,披露收集了哪些信息和删除了哪些相关数据等。若违反《法案》,企业将面临最高7500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向每位消费者支付最高750美元的赔偿金。

《法案》一出台,立即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者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加州众议员周本立表示,美国许多企业的客户数据库出现严重信息泄露事件,引起全世界网民的重视和担忧。加州此次推出的新法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加州参议员鲍勃·赫茨伯格称,《法案》“不

仅是加州,也是全美国人民迈出的的一大步……将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

当然,也不乏针对《法案》的反对声音。谷歌高级副总裁斯里达尔·拉马斯瓦米表示,《法案》的一些条款令人“难以理解”,企业需要考虑周全才能在用户隐私与合法商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代表脸书、亚马逊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公共政策游说团体“互联网联盟”、加州商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全国广告商协会等机构纷纷亮出旗帜,明确表示反对。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飞速发展,互联